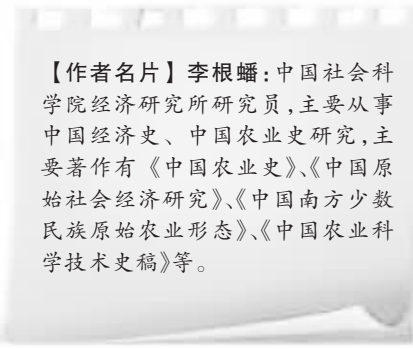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史学发展概览

走向繁荣 哲学社会科学60年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 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

现代经济史学，是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剖析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学科。现代经济史学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经济史等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形成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倡导史学革命，社会经济开始进入史家视野，陆续出现一些零星的经济史论著。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和发展。研究经济史的学术刊物、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相继出现，产生了一批内容涉及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从而大大超越了我国古代传统的“食货”式记述（其内容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政策主张）的经济史论著。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

编纂中国近代经济史—— 新中国经济史学的奠基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经济史虽然

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但在史学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得以确立，经济的基础作用得到重视，因而经济史研究被纳入史学的主流之中，并启动了两大工程。1953年，中央政府组织成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决定，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严中平牵头，编辑出版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书。到1966年，已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和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铁路、外债、公债等专题资料，同时开始了有关专题研究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纂。1960年，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的指示，组织以许涤新、吴承明为首的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专家，组成《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编写组，从编辑《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着手进行该项工作。《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中国经济史学发展中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们虽然是在“文革”以后才完成和出版的，但都是在“文革”前就从资料工作做起的。这些资料工作做得相当扎实，不但极大地推动了有关专题研究，而且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才，从而为整个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里，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围绕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开展热烈讨论，这些问题被喻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撬动古代经济史研究发展的杠杆。在“五朵金花”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资本主义萌芽本身就是经济史问题，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和汉民族的形成也与经济史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带来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长足发展，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前古代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唐宋以前的局面。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古代经济史著作，如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1962年编纂完成）、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1978年出版）等。某些专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在农业部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农史研究机构——农业遗产研究室，并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农学史》。

如何推动文化产业 发展振兴

前不久，国务院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必将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逆势而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目前，人们对文化产业发展普遍看好，各地纷纷推出文化产业发展新举措。在这种情况下，尤须冷静分析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认识、完善体制，促进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走出发展误区。《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是一个全面的指导性意见。对于各个地区而言，如何据此确定文化产业发展的短、中、长期规划以及具体方向、内容、路径等，还须认真研究和科学决策。目前，不少地方的文化产业发展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误区：一种是盲目型。在传统、现代与新兴文化产业发展上任意穿靴、随意而为，今天某个项目“火”了便大干快上，明天某种园区流行便批地设置。一种是自然型。在传统思维观念的影响下，对文化产业发展疏于支持，任其自然生长、自然淘汰。一种是求全型。传统、现代、新兴什么都要、什么都上，形成了“小而全”与自我封闭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一种是“跑马圈地”型。什么流行、什么时髦做什么，只要能够抢占到资金、土地和项目，就是发展成果。一种是偏好主导型。根据主管部门或某些人的喜好和认识来确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生产服务设置。《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发布实施，是各地正本清源、走出发展误区的契机。其中，应明确几个原则性和战略性问题：全面梳理和确定本区域的文化（产业）资源及其转化为文化（产业）资本的可能性，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优劣势比较；着重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产业，全面实施开放战略，建立市场运行机制；摒弃短期行为，以中长期发展为根本、为中心。也就是，各地应着力发展在全国范围内能够形成优势的特色文化产业，并使之融入全国文化产业的价值循环和发展链条，在谋求差异性的同时做大做强，形成产业自身的延伸与辐射；而在各省市

区所属区域内，则要整合资源、转换机制，强健主体、优势互补、有序发展。

全面推进改革。目前，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还没有理顺。在省市区一级体制层面上，文化、出版、广电、新闻、文联、作协、社会组织等行政、社会团体、企业、演艺单位等分属不明、各自为政和多头发展的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有关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些部门、团体和单位内部的具体改革，而较少涉及全面的、整体性的文化建设与发展体制的改革。这样一种方式和路径，或许能够带来文化产业主体一时的活跃，但难以解决阻碍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因此，必须贯彻落实《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对文化产业发展体制进行全面改革。一种可行的思路是：在政府部门的整体框架中，设立相对独立的文化产业发展与管理部门，对所有文化产业的内容、形态及相关资源、资本行使管理与服务职能，在此基础上，与党委宣传部门建立指导层联系。如是，则一直困扰文化产业发展的对接问题——资源与资本的对接、产品（项目）与企业的对接、企业与市场的对接、政府支持与发展需求的对接等，就具备了较好的解决条件。统一规划、全面整合、单一管辖、分属明确、强大主体、拓展市场，应成为目前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原则。

拓展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史学的全方位发展

改革开放后，人们研究经济史的积极性重新焕发出来。“六五”、“七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均把有关经济史的课题放在重要位置。中国经济史研究机构和队伍迅速恢复和发展。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史学会（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于1986年正式成立。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创刊。中国经济史学迎来了更大的发展高潮。

研究领域的拓展。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围绕现实生活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问题，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的热烈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经济现代化道路进行全面的再认识。在研究和讨论中，人们逐渐把研究的重点从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转移到经济发展和与现代化建设有关的问题上来，生产力的研究受到空前重视，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涵盖了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环节。

在近代经济史研究继续发展的同时，独立的古代经济史研究得到加强，特别是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从无到有，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1975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立新中国经济史组，开始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史和土地改革史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编纂。比较系统的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并很快成为中国经济史学中的独立新学科和新的研究热点。从初期的经验总结和政策阐释发展到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探讨，并积极引入现代经济学理论包括西方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研究的时段也延伸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新时期。

部门经济史方面，除农业史研究继续发展外，盐业史、商业史、市场史、金融史、城市史研究也十分活跃。区域经济史的勃兴引人注目。专题史、民族史的研究陆续展开。断代的、跨代的、贯通古今和中外对比的研究都在进行。可以说，中国经

济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

资料的发掘和整理。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是经济史研究的基础，这一工作在新时期以更大规模展开。数千万字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已经整理出版，“二五”计划的经济档案也在整理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将清朝大内档案中的粮价资料录入电脑，建成有关资料的数据库。除此之外，还有清实录经济史料、自贡盐业档案、徽州文书、孔府档案、巴县档案、企业史料丛书系列、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满铁资料等。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保定、无锡农村的长期跟踪调查继续进行。丰富多彩、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民间文书、族谱、碑刻和社会调查、习俗调查、民族调查等，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不断刷新、匡正或深化人们的认识。随着研究思路 and 领域的拓展，气象、水文、地理变迁等资料也得以入史。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基础比以往更为丰富和雄厚。

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多元化。新时期的经济史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新理论、新方法不断引进，出现了国内与海外的学术研究相互激荡的新局面，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思想空前活跃，新思路、新见解层出不穷。与此相联系的是，在研究方法方面突破了单一模式，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向。有的学者提倡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史，强调计量研究和经济分析，力图使中国经济史学更加精密化。另一些学者注重把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强调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推动社会史与经济史研究的结合。此外，许多学者分别把历史地理学、环境生态学、历史人口学、考古学、民族学等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多学科交叉融汇及其理论与方法相互渗透的潮流。

丰硕的研究成果。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发表的中国经济史论著接近2万种，其数量相当于此前有关论著的总和。在这些论著中，不乏有创意、有深度的成果。比较重要的，除上面提到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外，还有20世纪80年代中期分卷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严中平的《科学研究方法十讲》和吴承明的《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等。



我国地区收入差距变动的特征及应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各个地区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地区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出了挑战。研究和分析地区收入差距变动的趋势和特征，有利于有针对性地采取政策措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地区收入差距变动的主要特征

地区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扩大，在体制改革过程中阶梯上升。随着我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上升到2007年的18934元，总体地区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从0.12上升到0.21。1992年以后，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步伐加快，地区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从1992年的0.15上升到1995年的0.17。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以后，地区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扩大到2007年的0.21。这说明，我国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是发展中的不平衡、改革中的不同步，需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来解决。

农村地区收入差距大于城镇地区收入差距，而且波动更为明显。农村地区收入差距大约解释了总体地区收入差距的23%，远大于城镇地区收入差距对总体地区收入差距3%左右的解释率。这既反映出农业更易受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也说明我国城镇居民长期以来存在着平均主义分配倾向（特别是2002年以前），而近年来适度拉大的城镇地区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

较之东、中、西部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而言，城乡收入差距是总体地区收入差距形成和变动的主要原因。30多年来，城乡

人们的一切奋斗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关系是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基本视角。就我国经济生活中比较突出的结构问题来说，为什么一些明显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却长期存在、难以改变？因为它们虽然从宏观和整体上看是不合理的，但从微观经济主体来看则是合理的，是人们在特定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这启示我们，分析经济结构问题应从利益关系上去寻找原因，解决经济结构问题需要发挥市场调节利益的基础性作用。

关于内外需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过于依赖外需，是我国经济遭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直接原因。本来，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国经济应该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因为单是满足国内市场的庞大需求，就可以成就一批世界级的产业和企业。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偏大，而且出口的产品大都附加值低、可替代性强，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容易伤风感冒。这里边有发挥国际比较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等合理因素，但不可否认，与人为干预和市场扭曲也有很大关系。譬如，土地、资源、劳动力成本被压低，因而发展了很多高消耗、高污染产业；一些地方招商引资重数量、不重质量，引进的多数是产业链的低端环节，缺乏核心技术，出口数量很大却只能赚取一点加工费；行政壁垒、地方保护造成国内市

场分割，各地与国际市场联系的紧密程度甚至高于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

关于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国内消费不足，是导致大量过剩产能涌到国际市场寻找出路，进而导致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这除了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原因，还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资金和资源要素价格低，因而投资的成本低。二是一些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来的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一些政府部门直接成为投资主体，投资不计成本，不考虑风险，没有把市场需求、经济效益放在应有的位置。三是行政性垄断势力强大，不仅压缩了社会投资空间，妨碍了资源优化配置，而且导致收入

分配向企业倾斜，垄断利润大部分又转化为投资。垄断还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导致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不足。

关于产业结构不合理，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我国高投入、高消耗、资源型产业发展过快，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量不断下降。其主要根源在于：资源和环境价格偏低，不仅高消耗、高污染的低端产业仍有获利空间，而且技术水平低下、管理粗放的企业也能生存下去；企业可以通过廉价地使用资源和劳动力获利，就不会冒险去搞技术创新；一些重要的服务性行业存在垄断和市场准入问题，社会资本难以进入，投资单一、缺乏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发展缓慢、创新不足。

此外，区域经济同构化问题突出、区域分工和专业协作发展不充分的原因在于，地方保护、行政壁垒限制了商品和要素流动；城乡二元结构难以打破、农村发展滞后的原因在于，脱胎于计划经济的户籍制度及其上附着的各种权利和利益依然存在。

可见，我国一些长期存在的经济结构问题固然有市场盲目性的原因，但主要还是缘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调整经济结构，无疑需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作为，特别是有关政府部门应通过制定实施科学的产业政策、技术标准，通

过提供全面准确的市场信息等手段，引导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发展和转型升级。但应明确，结构调整实际上是一种资源重新配置，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利益机制是长期起作用的基础性机制，有什么样的利益导向，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行为，形成什么样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基础性工作是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利益机制来引导资源配置。在此基础上，“看得见的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学术随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新中国首都建设60年理论研讨会”研讨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性

杨 奎

北京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新中国首都建设60年理论研讨会”最近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围绕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过的艰辛历程和取得的宝贵经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性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认为，新中国60年的艰辛探索、成功实践、基本经验，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特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表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

革命道路和毛泽东思想；在当代，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我们党必须以勇于探索、实事求是、继往开来、群众路线等中国作风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特性。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相贯通，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学术信息

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地理位置、对外开放、国家发展战略、劳动力迁移、城镇化、国家相关政策调整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未来，这些因素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矫正和引导相关因素发挥作用的方向和力度，改变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物质资本积累。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通过提高市场化水平、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等，改善中西部地区的软硬环境，以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融资能力。

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取消限制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逐步弱化以至废除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大力培育劳动力市场，科学推进城镇化建设。

努力增加农民非农收入。基于比较优势原则，继续扶持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在税收和融资方面支持农户开展非农产业经营。

加大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入。例如，大力普及基础义务教育，组织开展各种就业培训等，以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

地区收入差距变动的原因及应对

30多年来地区收入差距的演变，是物